

明末清初的學風

謝國楨著

人民出版社

K242.7/3

明末清初的學風

謝國楨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69399



869.190

封面设计：马少腰

明末清初的学风

谢国桢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216,000字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1,500

书号 11001·469 定价 0.94元

自序

我在1963年春天，曾参加过四川大学历史系纪念顾炎武诞生三百五十年学术讨论会，提出的论文题目是《明末清初的学风》，来商讨顾炎武学术的特点和当时社会上研究学术思想的风气。我认为研究历史事实，必须明瞭当时社会的背景，事实的发生与发展，融汇贯通于胸中，取得事物的内在联系，对于每一事物提出自己的看法，写出文章来，才能够“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不然的话，但凭个人的意见，不顾客观的事实随心所欲地找几条材料来作佐证和充实自己的意见，那就会对某一个事实见首而不见尾，光见事物的片面或表面，而不见事物的本质和根源，那就好象见人而不见物，光见树木而不见树林了。这十几年来，就我研究明清史范围之内，写了十来篇文章，承吴泽、白寿彝诸位同志认为还有点用处，又承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叫我编一部论文集子，把解放以前我写的这类文字，如《清初东北流人考》，也编排在内，就定名为《明末清初的学风》，来说明我平生研治学问旨趣的所在。

惭愧的是，我的理论水平极为低下，虽然喜欢搜辑明清时代野史笔记的资料；但是囿于见闻，遗漏孔多。又赋性疏懒，纂辑不勤，愧不能绍述全祖望、杨凤苞治明清史学的遗风，也不过聆师友的教益，摭拾旧闻，追随于孟森先生所著《心史丛刊》之后，纂辑成篇。然草率从事，虽有其志，而力有未逮。又兼着奔走南北，谋求衣食，虚度了岁月，因之从髫龄就学，一直到头童齿豁，垂老而无成，发稍倒简，仅搜集了这十来篇不成熟的文字，不揣固陋，编成这个集子，清

读者同志们指正,和考验我治学的勤惰而已。不过,我要说的是,明清时代是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就是我国的近古史,要考求目前的形势与其历史的根源都很有关系。尤其是,自解放以来,新发现的资料,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文化上,蕴藏着许多新的内容,要研究的问题也日渐其多,说起来虽经党和政府的重视,由于人力的不够充足,还是一个空白点,正待于爱好文史哲学同志们群策群力起来整理和研究,我不胜企予望之。我这篇文章,说不上抛砖引玉,也不过是浮光掠影,击水振荡成声而已。

1980年12月16日记于北京

目 次

自序

❶(一)明末清初的学风	1
(二)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及其迟缓发展的原因	53
(三)清初利用汉族地主集团所施行的统治政策	70
❷(四)明清野史笔记概述	88
(五)清初东北流人考	105
(六)顾炎武与惊隐诗社	182
(七)记宣南诗会图卷	201
❸(八)清代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	211
(九)记明万历四十八年平价米票	225
(十)略论明代农民起义	232
(十一)明末农民大起义在江南的影响——“削鼻班” 和“乌龙会”	246
(十二)《聊斋志异》所涉及的清初农民起义事迹补证	262
附录	
梁启超先生少年逸事	275
我的治学经历	280

地图和图片目录

清初流人由北京到东北谪戍地点示意图.....	112—113
宣南诗会图卷	203
明万历四十八年平价米票	225

(一) 明末清初的学风

一、叙说 社会的背景和思想的根源

近年来明末清初的学者很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在一九六三年间,继王船山学说讨论会之后,南京大学和四川大学都举行了顾亭林三百五十年纪念学术讨论会,叫我发言和写论文,以我学问的浅陋,是当之而有愧的。不过,我想明末的学者当不仅止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所谓明末清初的三大儒;而是当时的学者人才辈出,著作如林,在学术史上都占有应有的地位。为什么在这个大动荡时期,产生了这如许多的学者,在学术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尤其是象顾、黄、王诸家的学说,不是孤立而产生的,不可不谈一下明末清初的学风。

在吾国学术史上,有划时代的几个时期,呈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象春秋战国先秦诸子、西汉经学、东汉党锢、魏晋哲学、宋元理学等,其在程度上和性质上各有不同,而且各有特殊的作风。我认为明末清初的学者,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风格,有东汉党锢坚贞的气节,摆在历史的进程上,有并驾齐驱的局势,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作用,从明清以来封建社会黑暗的统治中,在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舆论上又发出光彩,可以说是在吾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开了灿烂的花朵。

我所说的明末清初学者所处的时期,是指着公元十七世纪,即明万历三十年以后到清康熙四十年左右(1602—1701)这百年中,

在这个时期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非常众多,有的是已经家弦户诵;有的是经过清朝统治者的毁禁,是否是尚在天壤间,正在于发掘和整理。我们有这个责任,写出一本《明末清初学术文化史》的;但我知识浅陋,理论水平低下,又限于时日,仅就我平日读书的所得,把当时社会的背景,思想的根源和近年来学者研究的成果,综合论述,试图概括地说明明末清初学风中的几个特点,作为发轫之始,供诸大家商讨。

学术思想是时代的反映,明末清初的学风,为什么会有这样豪迈的风格,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多种多样的体裁?我认为固然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同时又由于明末农民的大起义摧毁了明朝的腐朽政权,也有力地打击了满洲贵族。这个时代正是当时人士所谓“天崩地解”的时期,农民群众做出了当家作主人的豪迈气势,谴责统治者的贪婪罪行,如同解剖一样,把社会上阴暗的一面,都暴露出来,从而使比较前进有头脑的人士触目惊心,写下了篇章,反映到学术思想、史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方面,因之其中以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意识为其主要的促成条件,同时也有其他及外来的影响,是错综复杂相互交织而成的。概括起来有下列的几个原因:

(一)由于明中叶以来社会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在运河两岸以及江南一带出现了很多小村镇和城市,商店小手工业作坊到处皆是^①,这些地区的商业经营,虽然不脱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范畴;但是已经有脱离农业生产的小手工业者、经营小手工业作坊的商人和雇佣工人的出现。又由于当时交通的便利,苏松棉织品和丝织品,江西的陶瓷,西北的毛织品可以销行到全国。全国的大都会北京和南京以及苏、松、扬州等地既为政治、经济的中心区,也是文化的城市,尤其是南京为明朝的留都,各省的人士都集中到南京来,

^① 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赵世卿奏疏》。

成为人文荟萃的区域。还有扬州为明朝经营商业的城市，许多徽州商人都迁居扬州，有些变成为小市民中的知识分子。所以在明崇祯间复社在苏州虎邱开会，到会的成员就有两三千人，复社的人士在留都驱逐魏忠贤余孽阮大铖，贴出了“南京防乱公揭”，列名的就有好几省的人士，这说明明末各省人士，能够荟集在一起，是与明末的商业和运输交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明末遗民钱秉铎赠方密之江上纪事的诗，有：“武昌公子束装轻，便寄扬州估舶行”的诗句^①，可以作为证明。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明末学风兴起的社会背景；至于资本主义萌芽是如何的产生，不属于这个论题之内，就不再多谈。

(二)明自正统以来土地的大量兼并，庄田的兴起，皇室有皇庄，又有王府庄田和勋戚庄田，告老的官员地主豪绅也田连阡陌动以千百顷计。农民自耕的土地面积很少，所谓：“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② 吴中一地如是，其它各省情形可知。随着万历以来江南各地商业经济的发达，更刺激了统治者的胃口，统治者以矿税为名，派宦官到各处去敲榨和勒索，激起了各省反矿税的斗争。又兼着江南各地地主豪绅虐待耕田和家内使用的奴仆（佃农），大江南北普遍发生了所谓家内奴仆的暴动，当时所谓“奴变”，尤其是陕北边塞荒寒受灾害最多的地区，在一六二八年（崇祯元年）终于爆发了西北农民的大起义。从阶级立场上来看，在封建社会内地主阶级中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同情于农民起义的，虽然农民起义伟大的举动，活生生的事实摆在这里，他们却说农民军的起义是“假行仁义”^③，甚至骂农民军为“盗贼”和“流寇”。明末遗民屈大均等所写的《四朝成仁录》等书，把明末死难之士，

① 钱秉铎：《藏山阁诗存卷一·过江集·同方密之江上纪事》。

② 顾炎武：《别本菰中随笔》卷2上。

③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1。

死于“贼”和死于“虏”(满洲)的等量同观，均称之为杀身成仁的志士。因为农民军把明朝士大夫所崇拜的偶像——崇祯皇帝逼的吊死在煤山，而称农民军为仁义之师，是不合于当时情况的，象四川学者唐甄曾比帝王如盗贼，又说崇祯帝是一个暴君，就受到他的朋友王源的訾议。尽管如此，明末党社中的人士与当权的官僚们虽同属于地主统治阶级之内，但统治者经常痛恨“处士横议，品核公卿”，甚至于骂他们为盗贼，范曄《后汉书·党锢传》上不是说过吗？“党锢久集，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明末保守的理学家张履祥也说：“东南坛坫，西北干戈，其乱一也。”当时有人说，社集的号召，群众的景从，而且他们彼此之间的契合，一呼而集，实与盗贼的行为无异。党社中的人士，他们自认为与农民起义的群众有所区别；可是统治者却认为社集中人士评论朝政，干犯公卿，与盗贼的行为，同流合污差不了多少，这是应当如何理解呢？从下节里的分析，就可以明瞭这个原因。

(三)当时党社中人士从阶级成分来说，东林党的成员，大半出于地主阶级的上层分子，地主阶级也有开明派和保守派，东林党是属于开明的一派，同时其中的成员如李三才、顾宪成又是江南的地主而兼营工商业者。东林党人为了维护明朝的统治政权，要改良朝政，澄清吏治，李三才所上的《请罢矿税的奏疏》、周顺昌等请制止矿使四出骚扰的暴行，这是与其本身所经营的江南工商业利益有密切之关系的，至于复社的成员大半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中下阶层，有时还参加了出身于工商业中间的知识分子，从其本身来说就有切己的利害，在其主观愿望上虽然维护其本阶级的利益，但是间接的同情于人民，有其积极的一面，遂得到人民群众舆论的支持。人民群众的利害与统治者的要求是对立的，正如顾宪成所说：“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①在统治者看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8《东林学案》。

来“东南坛坫和西北干戈”，就等类而齐观了。但是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是软弱而无力的，不能起来反抗统治者的政权，终于受到统治者的宰割，目为党人而以禁锢了之。

由于明朝统治者的种种暴行，培克峻敛，西北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针对着当时的弊政，提出了“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的口号，做出了改变明朝的行政机构和“改正文体”等等措施。农民军这样轰轰烈烈的运动明朝的士大夫是不能充耳不闻的。尤其是读书人士，他们虽然不能同情于农民军，但是知识分子思想是敏感的。明末的前进学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对于当时君主的庸暗，土地的集中，赋役的剥削，对于新兴的手工业和商业的摧残，五蠹吏胥的虐民，科举的腐败，都有所认识。在顾炎武所著的《日知录》、《别本菰中随笔》，黄宗羲所著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所著的《噩梦》和《黄书》，抨击了当时的朝政，提出了鲜明的主张，做出了足够的论述。明末的学者与农民起义在其阶级立场的本质虽有不同，但是维护其本阶级的利益而与劳动人民同受其害时，可能说出些公平的话来。所以当阶级矛盾转变而为民族矛盾之时，明末的前进人士可能同情于农民军。当山东农民谢迁攻克淄川，惩治了汉奸孙之獬，处以死刑，明末的大儒顾炎武听见了这个消息，就为之赞叹不置，做出了“鼓逢逢，旗猎猎”^①这样赞美的诗句。象阎尔梅、叶廷秀等人有可能参加山东榆园农民军从事于共同抗清的运动。明末农民军的大起义，摧毁了明朝的腐朽政权，有力的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这伟大的事实，影响于人民的脑海中，遂成为明末人士思想言论中的主题了。

（四）祖国人民在学术文化上有优良的传统，他能够容纳众长

① 佚名：《研堂见闻杂记》；顾炎武：《亭林诗集》卷2，《淄川行》。

而扬弃其所短。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丰富了明末学者的思想内容,对于旧的起了怀疑,更提出了新的主张。同时在十六、七世纪,海外侵略者的东来,以天主教迷信色彩来麻痹人民,可是附带的也带来了欧洲比较新颖的科学知识,在吾国对于哲知和封建社会的伦常道德上的义理之学已有理论的根据,但是对于“制器尚象”自然科学和物理学等,尤在幼稚时期,明朝的学者自徐光启、李之藻以后,出现了象梅文鼎、王锡阐、孙兰等杰出的天文算学家,接着象王征、薄珏等人阐述了物理学和机械学,写出了《奇器图说》等书,对于农业生产技术上深有所发明,在天文、历法、水法、火器、动物物理学上都有新的成就。这都不可以不说受外来的影响。但是明末的哲学家方以智就深刻地看出西来传教士的弊端,他说:“万历年间泰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志士推之,彼之质测尤未备也。”^①这就是说泰西的学问长于“制器尚象”而不长于明理,就是他们质测的方法做的还是不够的。同时,又有一位学者,名叫孙兰,他曾从泰西人汤若望学习天文地理,著有《柳庭舆地隅说》,他就怀疑到汤若望曾灌输给他耶稣会士的教旨,而不大愿意教他天文历算之学。因之他断然地说:“常谓西儒以七克为教,似近于孔门克己复礼。然接其人,聆其论,咸精于历数,合于制器尚象之旨;独膜拜天神,侈言天堂地狱,则异教也。”^②“精研西学而不师其教”,从而说明了我国的学人,能够采纳众长而扬弃其短。当时的学者是受了当时社会物质条件的制约和农民大起义声威的影响,批判地接受了外来的影响,迂回曲折,反映到学术文化上,遂蔚成为明末清初的学风。

① 方以智:《物理小识·叙例》。

② 孙兰:《柳庭舆地隅说》。

二、明末社集和明末遗民所产生的学风

我们要谈明末清初的学风，不可不先谈明末的党社运动，在一六〇四年即明万历三十二年间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所创办的东林书院，反对他们的人就叫他们做东林党。东林书院讲学的宗旨，在于评论朝政，衡量公卿，“论学以世为体，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①东林党中，峥嵘露头角的人物，出现了杨涟、左光斗诸君子，与反动的阉党展开了不懈的斗争。继东林而后，就是以张溥、张采等所创办的复社，明末的遗民和学者，多半出于复社中的人士，当时有“小东林”之称，可见东林与复社是一脉相传的。明末清初的学者距东林讲学的时间较晚一些，所以我在这里对于东林党暂且不谈，而概括地介绍一下明末的社集。

明末士子的结社，所谓社集，起于明崇祯的初年，迄于清康熙的初年，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但明朝士子结社的风气不始于明末，明朝的读书人士以文会友，诗酒唱和，提倡风雅，南京为明朝的留都，人文荟萃之地，自从明嘉靖以来，白下青溪，结社之风已经很盛，见于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到了天启末年太仓人张溥、张采，苏州人杨维斗等所创办的应社，其初的目的也不过是为着士子应付考试，猎取功名，大家聚集在一块学习经义，揣摩风气，作为进身之阶。张溥等人很有抱负，认为这样做还不够的，必须集合多方面的人士，砥砺名节，“共兴复古学，将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改名为复社”^②，他们还“刑牲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8。

② 陆世仪：《复社纪略》。

而盟，告之天地，倚盖终身，砥砺期许。”^①因之社集，当时又叫做“社盟”。当时称江西安徽等地叫上江，苏松和浙东西等地叫做下江。于是会合了大江南北各地方的社集，“因之云间有几社，浙西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而吴门别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朋大社，金会于吴，统合于复社。”^②当时有气节而知名的人士象几社的领袖陈子龙、夏允彝，皖中的名士吴应箕、刘城、方以智等人，都参加了复社。在一六二九年即崇祯二年成立了尹山大会，从崇祯二年到五年在南京和苏州的虎邱共举行过三次的大会，到会的同志见于《复会姓氏录》的共有二千二十五人，终于在一六三八年即崇祯十一年复社的成员聚集在南京，为了驱逐阉党余孽阮大铖，公推东林子弟顾杲、天启被难黄尊素之子黄宗羲为首，宣布了《留都防乱公揭》，扶持正义，制止了阉党余孽的猖狂进攻，这可以说是复社作为领导的社集初期。

一六四四年五月汉奸吴三桂勾引清兵进入北京，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权，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掌握了政权，史可法被逼出镇扬州。马、阮辈要排除异己，想把党社中的人士一网打尽，复社的成员曾经有在北京参加过大顺农民军的，说他们背叛朝廷，就制定颁布了“顺案”，把周铤、雷演祚处以死刑，其他分为降顺、附逆六等，以次论罪，但是对于投降清朝的却不论罪，迫得社集中人士东逃西散仅免于难。当时有骨气的人士象陈子龙曾任弘光朝的户科给事中，他认清要恢复明朝，只有积极图强，走向抗清这一条道路，一月之中，奏章上了数十次，不能见用，知难而退，归隐松江。嘉定的进士黄淳耀等，感觉到弘光小朝廷不足有为，干脆隐居田园，

① 陆世仪：《复社纪略》，及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②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并参考汪有典：《史外·吴应箕传》。

讲学鸣志，策励后进。可是腐朽的弘光王朝不过一年就垮台了。扬州南京相继沦陷，清兵急转直下，南进江南，这抵御的重任只有落在人民群众的双肩上。于是一六四五年的六七月间，清兵直下江南之时，嘉定的进士黄淳耀和侯峒曾等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坚守嘉定抗拒清兵，几社领袖陈子龙、夏允彝也起兵松江，明末大儒、复社成员顾炎武和吴其沆等起兵昆山，大江南北起义抗清的领导者，大半出于社集中的人士，尤其是陈子龙曾做过绍兴推官，浙东抗清的将领，如钱肃乐、张煌言与复社和几社有密切的关系。这时社集中人物由统治阶级内部反阉党的斗争转变而为以民族矛盾为主体的抗清斗争；这与明末的农民起义军由阶级斗争转变而为民族的抗清斗争相比较，他们的阶级立场上虽有不同，可是其目标上是一致的，这可以说是明末社集的中期。

到了乙酉、丙戌（一六四五——四六）以后，江浙等地已入清朝的统治范围，可是自从一六四八年荆襄十三家军和李定国所率领的大西农民军，以及郑成功所率领的海上之师，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清战争，各地方的志士仁人都参加了英勇不屈的抗清战斗，就是在清军占领区内，不仅在江南，而且在河北山右的革命志士也图谋恢复，积极响应，参加支援川陇、海上义师的工作。清朝政府寻找发生事变的根源，不得不注意于士子的结社，于是在一六六〇年即清顺治十七年颁布了严禁社盟的命令，因之当时有心人士就由公开的结社转变为地下秘密的活动。尽管在清朝禁网之下，从顺治十年左右到康熙初年，各地人士仍然秘密结社。就其显著的来说吧，以我所知道的，在苏州就有叶恒奏、顾炎武等所举办的惊隐诗社，在淮上就有阎修龄等所举办的望社，在宁波就有六狂生陆宇燏等所组成的两湖八子、南湖九子等社，在广东就有屈大均为首所创立的西园诗社，在沈阳就有僧甬可等所结合的冰天诗社，沈光文等在台湾所结合的海外几社，他们或是积极响应海上的义师，或是蓄志密

谋作恢复的事业，甚至影响到东北和台湾。结社运动表面上是缩小了，而影响的范围却是扩大了，这可以说是社集的后期。

我们从上面所说事实来看，复社为什么能集合各省的人士，参加的成员到二三千人？同时明末的结社前后相继延续到四五十年之久？是否可以说是象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党，我们不能这样的来谈；但是明末的结社有它的组织，有它的目标和企图，这是可以断言的。当然复社人士在金陵大会的时候在那里画舫笙歌，酒食争逐，是地主阶级士大夫颓废的作风，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是我们不能只从消极的一面去看，而也应当从积极的一面来谈，我们从其组成的情况来说吧，复社开大会时所召集大江南北的成员，在十七世纪的年代，虽然交通较前便利，但路途还算是遥远的，为什么能一呼而集呢？陆世仪在《复社纪略》就说到：“各郡邑中推择一人为长，司纠弹要约，往来传置，天如于是哀十五国之文而诤次之。”朱鹤龄《愚庵小集·传家质言》上说：“庚午、辛未间，复社盛兴，舟车之会，几遍海内，每邑以一二人主其事，招致才隽之士，大集虎邱。”这是说明了复社有了组织。当然在那个时期，只是充当招集者，有了彼此联系的关系，他们的组织还是很幼稚的。

复社的形成，还有他的宗旨和目标，他们既申之以盟誓，还规定了立身处世的方向和诺言，复社的盟词上说：

“毋蹈匪彝，毋读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则摈。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①

他们彼此之间称同志。明末湖北天门县的学者郭都贤，史可法和魏禧都出于郭氏之门，都贤与宁乡陶汝璜为最要好的朋友，都贤给陶汝璜所著《褐玉堂集》的序有：“有生同里，长同学，出处患

① 陆世仪：《复社纪略》。